

在“百日王朝”兴衰史中注入现代哲学思考 ——评路易·阿拉贡的小说《拿破仑离开厄尔巴岛》

徐真华



【摘要】 本文以法国作家路易·阿拉贡的长篇小说《拿破仑离开厄尔巴岛》为研究对象,聚焦小说以19世纪初拿破仑“百日王朝”兴衰为背景的核心设定,展开批判性分析,并从现代哲学视角探讨其历史意义。本文首先追溯拿破仑“百日王朝”的政治轨迹——从远征俄国失败后被迫退位,到短暂复辟,再到兵败滑铁卢的最终结局,指出其败亡根源不仅在于欧洲封建君主组建的第七次反法联盟的军事干预,更折射出战争苦难中法兰西民众的人心向背。本文还聚焦青年画家泰奥多尔的精神蜕变过程,通过分析他对波旁王朝与拿破仑帝国的反思,揭示其对战争、和平与社会正义的认知重构。最后,本文剖析了阿拉贡的创作意图,指出作者借泰奥多尔的心路历程,将历史叙事与现代生存图景相勾连,进而张扬了独立自主的人格力量。

【关键词】 拿破仑;百日王朝;复辟;反复辟;泰奥多尔;反思;选择

1. 历史回望:复辟与反复辟

法国当代著名作家路易·阿拉贡(Louis Aragon, 1897—1982)创作的长篇小说《拿破仑离开厄尔巴岛》(*La Semaine Sainte*)细致梳理了19世纪早期欧洲新生资本主义制度与腐朽的波旁复辟王朝反复较量的历史脉络。

今天,当我们重读这部小说时,似乎仍有必要循着阿拉贡的思考、言说、构想,重温那幅风云变幻的历史画卷。

为迫使俄国退出欧洲君主国组建的反法联盟,进而恢复法国在欧洲大陆的霸权地位,1812年6月24日,拿破仑统率60万大军远征俄国。然而,这场征俄战争以法国惨败告终。英国、俄国、普鲁士、奥地利等国的封建君主迅速成立第六次反法联盟。1814年联军攻入巴黎,拿破仑被迫退位。此前被1789年法国大革命推

翻的波旁王室,在联军刺刀的庇护下重返首都。路易十八恢复了波旁王朝的封建统治。然而,经历了大革命洗礼的法国民众并不认可复辟王朝的倒行逆施。路易十八治国无方,经济每况愈下,通货膨胀加剧,农民和工人的生活陷入困境;而王公贵族的特权却变本加厉、更趋膨胀。民众和社会的不满与反抗情绪在持续积累、蔓延。

1814 年被流放到厄尔巴岛后,拿破仑一直在寻找机会重返法国。1815 年 2 月 26 日,他带着在岛上训练的上千名士兵,乘船逃离厄尔巴岛,“乘着朝霞,拿破仑的船队载着 1000 多名士兵和几门大炮,向法国海岸驰去。晨雾中,海岸越来越近,此刻,拿破仑在想:‘最坏的结果无非是失败与死亡,那么最好的结果呢?给法国一部宪法,我自己也得安于经由两院治理的国家。独裁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埃米尔·路德维希,2013:252)拿破仑侥幸逃脱,船队最终在马赛南部 20 公里处的昂蒂布成功靠岸。闻讯而来的当地民众对拿破仑表示热烈欢迎,民众的热情鼓舞了他的斗志。他一路向北,在靠近拉缪的格勒诺布尔城外,第一次遭遇了政府军。这些军官曾经宣誓效忠国王路易十八,正如他们过去也曾宣誓效忠拿破仑一样。拿破仑下了马,向前迈了十几步,喊道:“第五军团的士兵们,你们不认识我了吗?你们当中要是有人想杀死他的皇帝,可以上前来杀死我。我,拿破仑,就在这里!”说着,他敞开了自己的灰色大衣,睁大眼睛,毫无畏惧。这时士兵们喊道:“皇帝万岁!”(埃米尔·路德维希,2013:253)

3 月 20 日,拿破仑进入巴黎,大批已归顺波旁王朝的高级将领,一如内伊元帅,纷纷率部倒戈,宣布脱离复辟王朝,服从拿破仑的指挥。翌日,拿破仑发布宣言,号召民众拔掉那早已被抛弃的百合花旗,把三色国旗高高举起。路易十八见大势已去,不得不逃往比利时。

4 月,拿破仑在法国参议院重申自己的皇帝地位,并迅速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推出一系列改革举措:政治上,他承诺推进广泛的民主改革,包括取消封建爵位、没收流亡贵族的庄园、解散王家卫队、释放政治犯、恢复被流放者的公民权利等,以争取民众对帝国的支持;军事上,为对抗欧洲反法联盟,他试图重建法兰西军队,但是,由于财力不足,皇帝的军队无论从规模、装备,还是在战斗力上均已远非昔比;经济上,他发布《法朗堡宣言》,宣布废除封建制度,取消教会和贵族的特权,废除国内关卡,取消封建地租和一切封建义务,实行宗教信仰自由和民事婚姻制度,恢复公民对土地的占有权。然而,这一系列政治、军事、经济领域的重大改革并没有得到有效实施,拿破仑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重振他的帝国梦。

拿破仑重返巴黎令欧洲的封建君主们惊恐不已。他们随即组建了第七次反法联盟。3 月 13 日,英国、奥地利、俄国、瑞典、普鲁士、荷兰、西班牙、葡萄牙 8 个联盟国签署宣言,以“保卫和平”为借口,决定每个成员国出兵 15 万,共同抵御拿破仑的军事威胁。(德·谢·梅列日科夫斯基,2014:458)

1815年6月18日,拿破仑亲自指挥军队,与以英国、普鲁士为首的反法联军在比利时小镇滑铁卢展开决战,最终再遭惨败。兵败滑铁卢不仅标志着拿破仑军事生涯的终结,更直接动摇了其政治地位,最终决定了他本人及其帝国的命运。在欧洲反法联盟的逼迫之下,拿破仑于6月22日宣布第二次退位,随后被流放到圣赫勒拿岛,直至1821年逝世。

波旁王朝再次复辟。

从表面上看,拿破仑的失败是军事上的失败:奥地利亲王施瓦岑贝格率军经阿尔萨斯进入法国,瑞典王储贝尔纳多特经比利时进军,英国陆军元帅威灵顿经比利牛斯山推进,普鲁士元帅布吕歇尔则从比利时攻入巴黎,紧随其后的还有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反法联盟有现役军人35万人、预备役65万人,这如雪崩一般的百万大军滚滚涌向几乎不设防的法国。(德·谢·梅列日科夫斯基,2014:432)

但是军事胜负的背后,永远是民心向背的最终裁决。“在延续了25年的革命战争和皇帝的战争之后,法国像干渴的垂死之人渴求清水一样渴望和平。老人们在金字塔的沙漠中长眠^①,中年人在俄国的雪地里长眠^②,青年人在莱比锡的沼泽地长眠^③;只剩下儿童和妇女在地里耕种。‘没有牛拉犁,也可以用铁锹耕地嘛。’内政大臣安慰道。儿童们耕地,倒下的不是麦穗,而是儿童们自己,这血红色的收成。”(德·谢·梅列日科夫斯基,2014:432)

2. 青年画家、火枪手泰奥多尔的精神蜕变

《拿破仑离开厄尔巴岛》以丰富的想象力和深刻的洞察力,描绘了1815年春“百日王朝”的风云变幻:既展现了一个充斥私欲、背叛、交易、傲慢、偏见与谎言的现实世界,也呈现了一个饱含思想、探索和变革的精神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无论是草根百姓、军官士兵,还是王公贵族,都承受着岁月的煎熬、生活的磨难、死亡的威胁、道德的诘难和灵魂的拷问。

内伊元帅率领波旁王朝大军倒戈的消息犹如一颗重磅炸弹,令路易十八心惊胆战、信心全失。这位惶惶不可终日的国王,匆忙带着王室成员和近臣侍从,在庞大御林军的护送下,冒着复活节前夕的凄风苦雨,向比利时边境艰难跋涉。路易十八的火枪手、画家、军官泰奥多尔·热里科就在这支逃亡大军中。泰奥多尔目睹了帝国连年征战给百姓带来的苦难,也见证了贵族统治给劳苦大众带来的不幸。他向往共和,渴望温饱、工作与自由,但发现在共同的利益和一致的目标面前,民众难

① 指拿破仑1798年远征埃及。

② 指拿破仑1812年远征俄罗斯。

③ 指拿破仑1813年远征莱比锡。

以团结起来共同抗争。

在阿拉贡笔下,各色人等不再是戴着单一面具的芸芸众生,而是一个个表情复杂、内心丰富的多面体。他们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都得到了生动铺陈。逃亡大军在风雨中挣扎,饥饿、寒冷、疲劳与绝望折磨着每一个人。路易十八优柔寡断、反复无常、指挥失态;将帅们矛盾困惑、心怀鬼胎、举棋不定。泰奥多尔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一样,在风雨和彷徨无助中寻思着自己的出路。他的头脑是清醒的——自己与他们不是同路人,只是被时势裹挟,卷进了这支跟随国王逃难的队伍。眼见路易十八和他的王朝气数已尽,国王却念念不忘饕餮铺张;王公大臣们还蝇营狗苟于情妇和金币;见风使舵的将军元帅们盘算着如何在保皇阵营与共和阵营间选边站队;家世显赫的御林军军官们国难当头仍不忘寻欢作乐,肆意蹂躏外省少女……这些狼藉不堪的人和事,随着流亡大军沿圣·德尼、博韦、阿布里索、贝蒂纳、圣波勒等地一路向北,在省城府衙、农庄古堡、葡萄园、铁匠铺、酒肆杂货店一一上演。阿拉贡用他独特的语言和细腻的叙事风格把闻风丧胆的波旁王室、丑态百出的保皇贵族,以及国王、黎歇留公爵、马尔蒙元帅出逃时的种种窘状丑态描绘得淋漓尽致。同时,作者亦以豪放、生动的笔触展现了泰奥多尔由彷徨到醒悟的过程:他重新思考战争的价值、和平的意义、民众的出路、国家的命运、信仰的价值取向,以及生活与艺术的内心关联。

1789年7月,震惊欧洲的法国大革命催生了欧洲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人权宣言》和“自由、平等、博爱”的新思想冲破了数百年封建君主制的桎梏。但是共和政体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一系列激进的社会、政治改革未能缓和动荡不安的政局。这一复杂多变的形势把拿破仑推上了法兰西政治、军事舞台的中心。1799年,拿破仑发动雾月政变;1804年,他正式称帝,建立第一帝国。这位皇帝继承、保卫并发展了大革命精神,推动社会、法制、政治、军事方面的改革,暂时制止了混乱的政局。他亲率大军征战欧洲各国,与妄图扑灭法国大革命的君主国反法盟军展开殊死会战。恩格斯称他为“真正的伟大的波拿马”(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1971:273),认为他是欧洲“革命的代表,是革命原理的传播者,是旧的封建社会的摧毁者”(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1957:636)。

从1804年至1815年,拿破仑为巩固帝国的地位,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先后与欧洲封建列强展开了一系列硬仗,包括奥斯特里茨战役(1805年,击败俄奥联军)、耶拿战役(1806年,击败普鲁士军队)、弗里德兰战役(1807年,击败俄军)、艾劳战役(1807年,再次击败俄军)、瓦格拉姆战役(1809年,击败奥地利军队)、莫斯科战役(1812年,被俄罗斯击败)、莱比锡战役(1813年,被第六次反法联盟军击败)、滑铁卢战役(1815年,被英国、普鲁士等国的反法联军击败)。连年征战严重破坏了法国的经济秩序,巨大的人员及物资损失使得民众的生产、生活陷入困境,

国内阶级矛盾激化,国际外交关系进一步孤立。这一切加速了拿破仑帝国的崩溃。

在青年军官、火枪手泰奥多尔眼里,拿破仑从一名出身卑微的普通士兵逆袭为左右欧洲政治风云的大国统帅,是当之无愧的英雄。这是他从皇帝的政治主张与无与伦比的军功中得出的结论。作为第一帝国的缔造者,拿破仑亲自主持制定《法国民法典》。可是,他的视野不仅超越了法兰西的高山湖海,也超越了19世纪的时空:“我最伟大的思想之一是集合、联合各个民族,这些民族在地理上是统一的,但是被革命和政治分开、切割开来……我想要把所有单一的民族汇集成为一个国家的躯体。”(德·谢·梅列日科夫斯基,2014:42)他真正的理想是建立“欧洲联盟”(德·谢·梅列日科夫斯基,2014:43)。拿破仑似乎是一位睿智的预言家,今天欧盟的蓝图,似乎早在200多年前就已在他的脑海中酝酿。他是“不同于他人的造物”(斯塔尔夫夫人语)(德·谢·梅列日科夫斯基,2014:45),他是“一个为时过早的世界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语)。“他不是自己时代的同代人,而是无限遥远过去的同代人——在那个时代,当时‘整个大地只有一种语文和一种语言’,统一的人类;或者是无限遥远未来的同代人,到那个时候,只有‘一个羊群,一位牧羊人’。他似乎是另外一种创世的造物;他太古老,或者太新颖;属于洪水之前或者属于启示录时代。”(路易·阿拉贡,2024:377)

战争的硝烟击碎了君主制的幻想,帝制的梦想也沦为美好的泡影。阿拉贡仿佛为泰奥多尔赋予了全新的视角与不同寻常的思维方式:他开始反思皇帝的专制独裁与警察统治,诘问无休止的对外征战是否为帝国的最佳选择,质疑皇帝的复出是否会给苦难的民众带来和平与幸福。波旁王朝的封建统治让人绝望,皇帝的穷兵黩武同样让人看不到出路。泰奥多尔对皇帝的盲目崇拜开始动摇,他不再纠结于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政治立场。

在跟随波旁王朝败军逃亡的途中,泰奥多尔有太多机会接触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民众,目睹矿工、马车夫、泥水匠、纺织工、铁匠、乞丐、无产者、失地农民的悲惨生活。而在社会上层,王公贵族穷奢极侈、纸醉金迷。惊人的贫富差距使他的灵魂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意识的觉醒像一盆冰水浇灭了他勤王的热情——他不愿意做那个旧制度的殉葬者。新的思维方式使他放弃了对波旁王朝的幻想,也不再相信皇帝的征战是为了拯救法兰西这一漂亮口号。在他看来,这两派政治势力都不是苦难民众的救世主。于是,他义无反顾地脱下军装,坚决地脱离了这两大阵营的政治、军事冲突,决心与劳苦大众站在一起,用自己的画笔去表现、去呐喊、去伸张正义。

3. 文学家的哲思与阿拉贡的超越

泰奥多尔的精神嬗变又何尝不是阿拉贡本人的精神嬗变呢?

阿拉贡于 1927 年加入法国共产党。作为法共资深党员,他积极投身党的事业,曾当选法共中央委员。他从 20 世纪初的超现实主义文学运动步入文坛,后转向革命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德国法西斯入侵期间,作为“抵抗文学”的旗手,他用文学创作讴歌正义,鞭挞纳粹暴行。战后,他曾多次访问苏联,赞颂苏维埃的建设成就。然而,1956 年的匈牙利事件令他无法理解、痛心不已。从此,他似乎明白了许多道理,不再拘泥于二元对立的政治逻辑,也不再执着于非此即彼的绝对选择。他借泰奥多尔之口,诉说自己的理想信念,只为把艺术奉献给至高无上的人民——这是艺术家心灵的神圣归宿。

《拿破仑离开厄尔巴岛》由法国伽利玛出版社于 1958 年出版。从时间节点上推论,这部小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法国共产党内部一批杰出的知识分子的痛苦与失望。毫无疑问,阿拉贡在 19 世纪初“百日王朝”的兴衰史中,注入了一名 20 世纪中叶现代人的哲学思考:波旁王朝只是那个苟延残喘的旧制度的代表,其垮台是历史的必然;而打着革命旗号的拿破仑同样不是“明君”,帝国连年征战使法兰西的经济到了破产边缘,民众已经开始为食不果腹而抗议于巴黎街头。泰奥多尔力图超脱于这两大利益集团之上。从泰奥多尔身上,我们看到了阿拉贡的影子。泰奥多尔知道一定有一个更神圣的群体,一定有一种更崇高的利益需要他为之呐喊,为之奋斗。他知道,改变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的不是战争,改变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对立关系的也不是拿破仑的铁腕与强权,而是生产力的发展:“机器……索姆省有多少台勒尼纺纱机?这不只关乎呢绒或棉花……还涉及煤、焦炭、蒸汽……人们了解在矿山和冶炼厂发生的变革吗?机器带来了什么?机器改变了什么?它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进而改变了人自身……从前我们恐怕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对人的关心不够。要决定未来,不能只懂得驾驭军队。”(路易·阿拉贡,2024:200)

这是前国民公会议员茹贝尔对一直被帝国忽略的国内产业情势的分析。阿拉贡借茹贝尔之口提出了一个十分严肃的命题:推动法兰西社会进步的真正动力是什么?成功路径又在哪里?1789 年大革命后,欧洲大陆工业革命的兴起,彻底颠覆了人们对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的认知。茹贝尔明白,泰奥多尔也终于明白:唯有生产力的发展才能引导革命发展的方向,才能推动社会结构的合理变革,才能完善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

泰奥多尔思想的拐点由此而发生:“三色帽徽或白色帽徽!”泰奥多尔喊道:“这就是您给我提供的全部选择?如果帝国的国旗今天主要意味着军队,那它绝不是人民的军队,那是波拿巴的统治工具!不错,断头台已经从广场上消失了,但他们把年轻人编入军队,把他们派往欧洲各地充当宪兵……”(路易·阿拉贡,2024:377)“这就是您给我的全部选择?”这振聋发聩的惊天一问——泰奥多尔之问、阿拉贡之问——预示着主人公在精神层面实现了对二元对立绝对思维模式的巨大

超越。

早在1956年,阿拉贡就出版了诗集《未完成的小说》(Aragon,1956),并写下了著名诗篇《在新桥上》。在略带哀伤的气韵中,阿拉贡对自己年轻时的“形象”进行了真诚反思,力图与那个曾经迷惘、轻狂、幼稚、偏执、虚度年华的“旧我”完成一次精神上的切割。

.....

在新桥上我曾遇见
我自己过去的影子
眼眶里饱含着泪水
嘴里发出一声声诅咒

.....

新桥上我曾遇见
远方那另一个戴着假面的我
在那些没有颜色的日子里
他悄悄地叫了我一声同志

在新桥上我曾遇见
我双倍的无知和轻信
我久久地驻留在
我往昔的自己的影子里

在新桥上我曾遇见
我坐在早已磨损的石头上
把歌曲的叠句轻轻哼唱
这梦就是我的亮光

瞎了瞎了我曾遇见
和你的眸子一道寂灭
哦我失去驾驭的往昔
在新桥上

(瓦莱里,2013:239—243)

从《未完成的小说》到《拿破仑离开厄尔巴岛》,阿拉贡开始书写“自我”,一个不再狂热、不再愤懑、不再盲目自信的“自我”,一个清醒的共产党人的“自我”,一个突

破现状、摆脱困境的“自我”。是的,人无法改变过去,每个人都是一部未完成的小说!

参考文献:

- 德·谢·梅列日科夫斯基,2014. 拿破仑传 [M]. 杨德友,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路易·阿拉贡,2024. 拿破仑离开厄尔巴岛[M]. 徐真华,麦梅娟,陈学吟,译. 深圳:深圳出版社.
- 埃米尔·路德维希,2013. 拿破仑传[M]. 袁斌,译.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
-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195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197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七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 瓦莱里,2013. 法国现代诗抄[M]. 徐知免,译.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 ARAGON L,1956. *Le Roman inachevé*[M]. Paris:Gallimard.

Modern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s on the Rise and Fall of “Hundred Days”:

A Critical Study of Louis Aragon’s *La Semaine Sainte*

XU Zhenhua

Abstract: This paper conducts a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novel *La Semaine Sainte* by French writer Louis Aragon, setting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rise and fall of Napoleon’s “Hundred Days” in the early 19th century, and explores its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 philosophy. It first traces the political trajectory of Napoleon’s “Hundred Days”—from his failed expedition to Russia and forced abdication to his brief restoration and ultimate defeat at Waterloo. It argues that his downfall was not solely due to the military intervention of the Seventh Coalition Against France by European feudal monarchies, but also reflected the alienation of the French populace who had suffered greatly from the war. The paper also focuses on the spiritual metamorphosis of the young painter Théodore, through his reflections on the Bourbon Dynasty and the Napoleonic Empire, revealing his new perception of war, peace, and social justice. Finally, the paper analyzes Aragon’s creative intentions. By following Théodore’s mental journey of self-discovery, it reflects on historical narratives and modern survival scenarios, and highlights the power

of independent and autonomous personality.

Keywords: Napoleon; Hundred Days; restoration; counter-restoration; Théodore; reflection; choice

作者简介:

徐真华,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特聘教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资深教授,主要从事当代法国文学研究、高等教育管理研究。